

## 拉欽科《天上的兩個太陽：中蘇爭奪霸權的鬥爭》簡介

● 夏亞峰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關於冷戰時期中蘇關係的研究，近年來已成為冷戰研究的一個新熱點，超過了對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研究。這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蘇聯已不存在，成

為歷史名詞，而中國正在演變成一個另一種類型的超級大國，對中蘇關係的研究，可加深人們對這兩個大國差異性的認識；其二，俄國和中國新近解密的有關重要檔案資料，使人們有機會去重新認識和解讀冷戰時期的中蘇關係。

2009年，威爾遜中心出版社和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聯合推出拉欽科(Sergey Radchenko)所著的《天上的兩個太陽：中蘇爭奪霸權的鬥爭》(*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引用只註頁碼)，為這一研究的最新成果。拉欽科生於前蘇聯，2005年獲得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博士，師從著名冷戰史專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Nottingham University)寧波分校國際關係史高級講師。該書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擴展而成的，主要討論1962至1967年間的中蘇關係，始於中蘇1962年在應對古巴導彈危機的政策分歧和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反應，終於1967年初在北京發生的對蘇聯駐華使館的衝擊。

冷戰時期中蘇關係的研究成為冷戰研究的一個新熱點，原因在於：一、對中蘇關係的研究，可加深人們對這兩個大國差異性的認識；二、俄國和中國新近解密的有關重要檔案資料，使人們有機會去重新認識和解讀冷戰時期的中蘇關係。

為甚麼蘇聯領導人總是無法理解中國領導人對其在中蘇同盟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憂患？中國領導人為甚麼屢屢將蘇方真誠和解的姿態看成是陰謀與欺騙？這主要是因為中蘇兩國由於歷史原因及親身經歷，對對方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見和種族偏見。

拉欽科注意到，中蘇在這一時期的鬥爭，主要是在亞非拉國家爭取人心、贏得支持者、擴大影響。事實上，中蘇的主要競爭對象是朝鮮、印度支那三國和蒙古。拉欽科聲稱，本書採用「開明的現實主義分析法，並沒有對中蘇分裂提出全新的解釋。……由於冷戰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國家檔案的解密，學者能從中蘇兩國內部文化動機、個人信念、不滿以及政策制訂者的認知等方面，來考察和評估中蘇同盟關係」（頁17）。在他看來，蘇聯領導人認為中蘇分裂是由於中國試圖挑戰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所致，而不是出於抽象的意識形態之爭；蘇聯領導人認為中國根本沒有資格或能力擔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由於歷史形成的俄國人對中國人的種族偏見，影響了蘇聯領導人對華政策的制訂。

拉欽科認為，蘇聯領導人「不平等對待」中國人，是中蘇關係中的不穩定因素，加劇了意識形態的衝突（頁9）。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認為中蘇的不平等關係是歷史形成的，因而是合理的。原因有以下幾點：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德國所起的重要作用；蘇聯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絕對優勢地位。種族偏見也發揮了一些作用：十九世紀俄國探險家普哲瓦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在其書中把中國人描寫成缺乏信譽、怯懦和懶惰的人，這對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員產生影響，使他們傾向於認為中蘇關係為上下級關係（頁118-19）。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則認為自

己領導中國人民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因此自己的歷史功績和地位，遠遠高於赫魯曉夫。在毛看來，赫魯曉夫只不過是斯大林的應聲蟲。1956年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之後，毛就認為他自己而不是赫魯曉夫，應成為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頁11）。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之後，蘇聯新領導人試圖與中國改善關係，但由於許多原因，包括蘇聯新任領導人在外交方面缺乏經驗和擔心與中國人和解會給蘇聯人民造成他們軟弱的印象等，最終導致與中國人的緩和化為泡影。在1965至1967年間，蘇聯孤立中國的努力取得成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導致中國在內政外交屢屢受挫。

拉欽科承認，「毛比任何人對中蘇關係的破裂要負更多的責任，……中蘇同盟的解體正是因為北京和莫斯科對同盟的實質的理解完全不一樣」（頁17）。他同時指出，蘇聯領導人對中蘇關係的惡化應承擔與中國領導人相當的責任，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中蘇關係無法維持在現有的框架之下（頁17-18）。本書試圖回答赫魯曉夫及其繼承者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柯西金（Aleksei Kosygin）等如何認識和對付中國同志的挑釁。拉欽科筆下的蘇聯領導人對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失去控制，在黨際和個人外交方面笨手笨腳，在制訂政策方面優柔寡斷。他着重解釋的是：為甚麼蘇聯領導人總是無法理解中國領導人對其在中蘇同盟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憂患？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為甚麼對蘇方的友好信號視而不見，屢屢將蘇方真誠和解的姿態看成是陰謀

與欺騙？本書指出，這主要是因為中蘇兩國人民由於歷史原因及親身經歷，對對方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見和種族偏見(頁22)。

雖然本書討論的是中蘇關係，但作者的主要貢獻，在於使用了俄國和蒙古的解密檔案，以及作者對當事人的採訪，來解釋蘇聯領導人對華政策的動機及取向。作者很善於講故事，語言幽默、輕鬆活潑，將中蘇兩國在1960年代的鬥爭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尤其是對蘇方如何應付中蘇關係分裂的描繪入木三分。不過，本書對中文材料的使用沒有特別出彩的地方，主要是依賴中國學者的分析(頁18)；對中國領導人對蘇政策的動機及取向的闡述和分析，也顯得略為單薄。

全書除前言和結語部分，共分為四章。附件部分有四份關於這一時期中蘇關係原始檔案的英文翻譯件：三份來自前蘇聯外交部檔案館，一份是波蘭共產黨檔案。這些檔案材料向讀者展示了中蘇分裂後期幾個主角之間的個人衝突。

書中第一章標題為「誰出賣了革命？」。本章涉及從1962年10月的中印邊界衝突到1963年夏蘇、英、美三國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Limited Test Ban Treaty)這一時期的中蘇爭論與鬥爭。拉欽科討論了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對中蘇關係的影響、中蘇由於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引起的分歧和爭論、國內政治對中蘇外交鬥爭的影響，以及中蘇圍繞1963年7月莫斯科會談的鬥爭。中國領導人指責蘇聯領導集團出賣革命，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先是搞冒險主義，隨後在美國的威脅之下，又搞投降主義。赫魯曉夫

則自視為世界革命力量的領袖。他感到，儘管中蘇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兩國仍是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成員。因此，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赫魯曉夫多次表示希望與中國加強團結。然而，中國領導人對赫魯曉夫的這一友好姿態卻不予理會。於是，赫魯曉夫轉而尋求與西方的緩和，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

第二章標題為「一團糟的共產主義運動」。本章涉及1963年8月到1964年8月中蘇之間的鬥爭。拉欽科認為，中蘇分裂既是為了爭奪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更主要是爭奪在亞洲的主導地位(頁107)。在他看來，中國人儘管堅信他們的力量是其「信仰的堅定性」，卻是依靠經濟和軍事援助，收買了北朝鮮和北越的支持(頁72)；其他亞洲國家則利用中蘇分歧，從蘇聯人那裏得到更多的援助(頁84)。亞洲共產黨國家力量的重組，不僅僅是中蘇這一段時期鬥爭的結果，而且是中蘇在此之前政策的取向所致。1965年之前，蘇聯對越南支持不夠；同樣，在蒙古領導人1961年決定加入聯合國和蘇東集團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以表明其維護獨立自主和抗拒中國霸權的決心之後，中國於1964年停止了對蒙古的援助。

在拉欽科的筆下，赫魯曉夫試圖保住中蘇同盟，但政策反覆無常、外交手段顯得十分笨拙(頁71)；而毛澤東卻是精明老道，一心要使中蘇同盟關係破裂(頁87-91)。這當然與毛澤東的工於心計和老謀深算有關，但也是緣於赫魯曉夫堅持充

赫魯曉夫試圖保住中蘇同盟，但政策反覆無常、外交手段顯得笨拙；而毛澤東卻一心要使中蘇同盟關係破裂。這當然與毛的工於心計和老謀深算有關，但也是緣於赫魯曉夫堅持充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頭羊，對中蘇分歧中的實質問題缺乏正確認識。

中蘇分裂這個案例表明，蘇聯領導人最終拋棄意識形態的考量。儘管中國從表面上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從現實政治意義上看，中國是蘇聯的敵人。中國領導人也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蘇關係。與「蘇修」的鬥爭，不如與蘇聯（國家）的鬥爭重要。

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頭羊（頁92），對中蘇分歧中的實質問題缺乏正確認識（頁91），以及蘇聯領導人「在中蘇分裂的過程中總是落在中國人後面一拍，對北京的做法既無法控制、也不能理解」（頁103）。

第三章標題為「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和越南戰爭」。本章所涉從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到1966年初《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The USSR-MPR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的簽訂，應是本書的核心部分。拉欽科詳細論述了後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的對華政策。在赫魯曉夫下台後不久，蘇聯領導人曾試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但11月7日晚，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ii）酒後鼓動訪蘇的周恩來和賀龍推翻毛澤東。這一事件以及中蘇在抗美援朝問題上的政策分歧，導致中蘇和解的機遇不復存在。

拉欽科認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儘管注重以階級利益來確定外交政策，但在對華政策上，得出了與赫魯曉夫類似的結論，即拯救中蘇同盟已經無可作為了。因此，「赫魯曉夫下台並沒有導致中蘇關係的改善」（頁139），蘇聯新領導人對中蘇同盟的崩潰做出了不同解釋。「赫魯曉夫天真地信仰馬克思主義真理；意識形態因素促使他在1962至1963年間去盡力修復與中國人的關係」（頁71），但最終，赫魯曉夫還是放棄了意識形態的考量，用中蘇實力的較量（power politics）和文化因素來解釋中國問題，認定中國人不擇手段，企圖在以損

害蘇聯利益為條件的情況下成為強國。

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領導人最初將中蘇分裂的原因歸咎於赫魯曉夫的粗魯和草率的行為，並把共同的意識形態看成是雙方達成和解的基礎（頁162-63），但此時毛澤東主導了中蘇關係發展的趨勢。在積極準備與他臆想中的黨內對手攤牌之際，毛認為與蘇和解只會加強其對手劉少奇和黨的官僚機構的力量（頁163）。

第四章標題為「敵人」。本章主要討論了1966年爆發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對中蘇關係的影響。儘管拉欽科仍責備莫斯科試圖在社會主義陣營孤立中國，但他同時強調中國試圖將「毛主義」（Maoism）強加於其他國家。然而，中國很快失去一個又一個的追隨者，在共產主義世界與蘇聯爭奪權力的鬥爭敗下陣來（頁171）。在蘇共領導人看來，1966年中蘇的鬥爭已從意識形態之爭轉化為權力之爭。在文革爆發之初的1966年夏天，莫斯科對中國國內政治發展狀況了解很有限，但到年底，蘇聯外交官已得出文革主要是針對中國國內問題的結論（頁177、186）。由於對戰爭的恐懼，蘇聯領導人願意與美國攜手遏制中國（頁180、188）。

結論部分概述了1967年之後中蘇的鬥爭。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蘇繼續敵對，主要是由於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外交目標的恐懼。直到1989年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訪華，才得以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拉欽科認為，「中蘇同盟的解體，主

要是由於其內在結構的不平等所致。……中國是同盟中處於弱勢的小兄弟。中國人無法永遠接受這樣的從屬角色。與蘇聯的其他僕從國相比，中國是一個有眾多人口和豐富資源的大國」(頁206)。因此，中蘇分裂是權力之爭的結果，主要是緣於中國不滿處於中蘇同盟中的小兄弟地位。這不單是毛澤東和赫魯曉夫之間的權力之爭，更重要的是中俄兩大民族的文化 and 種族之爭。蘇共領導人看不起中共領導人，這

不僅僅表現為中國作為弱勢一方與傲慢的霸主蘇聯的鬥爭，還表現為毛與蘇聯領導人到底誰掌握絕對真理的鬥爭(頁206)。中蘇分裂這個案例表明，蘇聯領導人最終扔棄了意識形態的考量。儘管中國從表面上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從現實政治意義上看，中國是蘇聯的敵人。中國領導人也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蘇關係。與「蘇修」的鬥爭，不如與蘇聯(國家)的鬥爭重要(頁208)。

## 被屏蔽的卡廷事件的真相

### ● 孫傳釗



扎斯拉夫斯基 (Victor Zaslavsky) 著，根岸隆夫譯：《カチンの森——ポーランド指導階級の抹殺》(東京：みすず書房，2010)。

扎斯拉夫斯基 (Victor Zaslavsky) 的《階級清洗：卡廷屠殺》(*Pulizia di classe: Il massacro di Katyn*) 2006年在意大利出版時，歐美出版的有關文獻已經不下千餘種了。但是，扎氏的這部著作還是引起歐美學術界和讀書界的矚目。1940年卡廷慘案的輪廓今天已經大致清楚了。2010年4月，波蘭總統卡欽斯基 (Lech A. Kaczynski) 在斯摩棱斯克飛機失事遇難後，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 (Dimitri Medvedev) 向波蘭代總統科莫羅夫斯基 (Bronislaw Komorowski) 承諾，開放有關卡廷事件真相的所有國家檔案。如果這一承諾得到兌現，估計歐美會有更多關於卡廷事件的歷史著作問世，眾多尚未搞清楚的微觀疑案或許會有所澄清。

扎斯拉夫斯基的重點並不在更加深入細緻地考證當年幾十萬波蘭

扎斯拉夫斯基的重點並不在更加深入細緻地考證當年幾十萬波蘭被俘軍人下落的疑案，而是着力論證卡廷慘案自1943年進入人們視野之後，特別是蘇聯瓦解前三年間，其真相怎樣被戈爾巴喬夫不斷掩蓋起來的那段歷史及教訓。